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02

建军初期毛泽东的军民关系思想及其价值

王力, 吴琼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转向井冈山的过程中触及如何解决军队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成为构建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军队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和全力支持。毛泽东指导军队帮助建立农民武装和工农兵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让农民认识到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誓为工农利益奋斗。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军队的重要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人民利益打仗。军队为人民解放而战,广大人民无私支援人民军队,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古田会议决议》;人民利益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4-0008-08

军民关系问题是所有军队建设过程中面对的重大问题。军队为打仗而生,但军队的首要问题是生存,要生存就要解决物质生活资料,这就直接关涉从哪里获得基本生活物资,这就必然生发出军民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自己的军队之始,就明确了军队的宗旨、任务和目的,明确了为谁打仗和打仗的最终目的问题。本文主要阐述从秋收起义到古田会议召开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部队开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提出并不断完善成熟的军民关系思想。

一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构建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并未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而是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开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并开展北伐。在此过程中,周恩来、瞿秋白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①,但未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否

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的两次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了我们党在国共合作期间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②著名论断。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到长沙,开始组织和领导秋收暴动。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暴动问题时发表意见,再次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③毛泽东在湖南通过农村调查、召开会议等,确立了秋收暴动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应高

收稿日期:2023-05-26

作者简介:王力(1967—),男,河北行唐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①《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的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①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独立领导革命。毛泽东领导组建秋收起义部队时抛弃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使用“工农革命军”^②的名称,打起共产党的旗帜,建立起一支与以往的旧军队具有本质差异的、为广大工农利益开展武装斗争的新型军队。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时,决定并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开展秋收暴动。1927年9月9日爆发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未能形成预期的形势,19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部队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求发展。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向江西沿着罗霄山脉南下寻找立身之地,就遇到了军民关系问题,特别是军队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如何把这支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的军队建设成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成为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都是在城市驻扎,部队的给养由国民政府解决,无需直接从居民那里获得生活物资,军队与城市居民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没有政府分发的粮饷,需要自己筹集军队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进驻农村后就只能向农民征集。农民是否自愿将粮食等物资给工农革命军?这就取决于农民能否认可和接纳这支还不为百姓熟知的部队,取决于党的领导人如何处理军民关系。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永新县三湾村时,当地群众不了解工农革命军的

性质,担心受到伤害,大部分村民躲进山里。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当时就“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③,让农民知道工农革命军不伤害老百姓,后来群众就陆续回到村里。面对这支刚刚组建且以农民为主要来源的军队(这支新组建的部队除卢德铭的警卫团外,大多数来自长沙及湘潭周边市县的工农义勇军和农民自卫军),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让农民接纳进而支持部队成为毛泽东及当时部队领导人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1927年9月29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会议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的建军原则,初步明确了党的领导与军队的关系。这次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制度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10月3日,毛泽东在带领部队向宁冈古城进发前向战士和干部宣布军队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④从现实的小事抓起,毛泽东开始制订军队纪律。

严明可行的制度和纪律是构建良好军民关系的前提。工农革命军在沿罗霄山脉南下进入农村后还没有明确的落脚点,如果这支部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史称“古城会议”),着重讨论“安家”问题,确定争取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立足于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方针,同时要求军队主动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革命的目的,扩大部队的政治影响。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准备上井冈山时,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②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的军队名称变迁: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军队是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1927年9月初,毛泽东以中共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参加在张家湾召开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不再使用“国民革命军”这一名称。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三湾改编”后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和毛泽东率领担任后卫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宁冈砬石会师,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指示在割据区域建立的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于1928年6月初改成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①这就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布置部队从遂川县城分兵下乡时，针对一些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等问题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②1928年4月3日，针对士兵中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毛泽东在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讲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九方面的纪律规定是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治军的理论探索成果。九方面的规定看似都是日常小事，但都是直接接触及百姓利益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这些小事情，就有可能因小失大，造成百姓对部队的反感和抵制。“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③后来增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构建新型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纪律规定。1928年8月下旬，得知部队在回师井冈山的途中因饥饿吃光了农民一块地里的苞米后，毛泽东通知部队休息，对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亲自写了一个牌子说明原因，并在地里埋了两块光洋。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的经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我军初创时期，就手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建军宗旨，在处理军队内外关系中最经常遇到的

具体问题上体现了出来，把最常见的‘小事情’提高到政治原则上来。这样，就在红军中彻底破除了旧军队欺压人民、虐待俘虏等等的军阀主义影响，确立了人民军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革命的民主传统。”^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构建密切和谐的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 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军队的宗旨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目的

在强化纪律约束的同时，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工农革命军充分发动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对农民问题作了研究和阐述，后来又通过实地调查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⑤。在1927年3月完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方法和途径，明确了“十四件大事”。1927年4月22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时指出：“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于全般革命有利益的。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⑥毛泽东明白农民问题的结症和农民需要什么，带领部队进入罗霄山脉的农村后迅速开展农民运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农民很快接纳了这支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得以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过程及内容表述有不同的说法。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1928年会议（第二次茅坪会议）以后，林彪为“六项注意”增加了“七、买东西要付钱；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房要远”，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参见《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5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字表述后经多次变化，直至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至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得以确定。

④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延续。

一是工农革命军领导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1927年11月下旬,针对第一团团团长陈浩等不发动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在给茶陵县党的领导人去信时,批评了陈浩等人的错误,主张“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①。工农革命军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或者只管打仗,更重要的是,通过打仗把旧军队和旧政府赶走,还要及时帮助当地建立人民政权,让人民成为主人。进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规定了工人、农民、士兵及其他贫民的政治权利,确立了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时机、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等事项。毛泽东还亲自指导建立工农政权及地方武装。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的宁冈、遂川、茶陵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帮助建立了湖南酃县赤卫队和区工农兵政府及一些乡的工农政权。工农政权建设实践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得贫民百姓明白了自己拥有的政治权益,懂得了祖祖辈辈受剥削压迫不是上天的安排,激发了广大穷苦百姓反抗旧政府的革命热情。

二是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给农民,让百姓切身感受到这支军队与以往旧军队的不同。1928年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到宁冈大陇开展土地革命。1928年3月30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在军队干部会上,决定分兵到附近乡村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试点。1928年6月,毛泽东多次主持红四军相关干部会议推动分兵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帮助建立农民武装和工农兵政权。1929年1月,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名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明确了“红军宗旨,民权革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②,宣告了中国共产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主张。1929年3月27日,在反围剿转战途中,毛泽东和朱德向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发布《警告士兵群众》书,其中明确指出:“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誓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到彻底的解放!”^③1929年4月中旬到5月中旬,红四军根据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的指示,以纵队为单位到于都、赣县、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区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和指导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这些具体的措施让人民群众真正明白了红军是自己的部队,是为穷苦百姓争取利益的军队。这支部队获得了当地农民的高度赞许和支持,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不断扩展。

毛泽东还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群众的疾苦和需求,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制定法律,保护农民利益。1928年12月,毛泽东在全面总结湘赣边界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制定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毛泽东又根据在于都和兴国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原来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④,探索土地分配法治化,以法律形式保护农民获得的田地不受侵害。

在近两年的军队建设和武装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和正确的策略原则,努力把一支带有原始游民思想的队伍打造成新型人民军队。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把当时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十四条,逐一分析每一问题的原因,除重点分析红四军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问题外,还专门分析了一些同志偏重军事观点忽视群众观点的问题。这些人只重视打大仗,忽视乃至抵制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明白也不去发展红军的政治影响。毛泽东特别指出部队中流寇思想作怪,“同时影响到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页。

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①。红军中一些人缺乏纪律观念且对军纪认识不一致,导致执纪宽严不一,直接影响军民关系。1929年6月22日,离开前委书记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在此后的五个月全面深入地思考军队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1929年11月26日重新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毛泽东又通过调查、座谈、讨论等形式,启发大家找问题,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促成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全面彻底解决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三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形成军民团结一体的革命力量

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现有文献看,党的军队建设问题,特别是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在1928年《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已经初步作了思考。毛泽东1929年4月5日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6月24日《给林彪的信》进一步思考了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思考如何建设一支新型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结晶,是毛泽东党建思想和建军思想里程碑式的文献,对于当代我国军队建设,特别是坚定党指挥枪的军队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学界关于《古田会议决议》的研究成果较多,基本上集中在毛泽东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党指挥枪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等方面,而党“为什么领导、如何领导”的问题还未得到挖掘,把这几篇文献结合起来阐释毛泽东建军思想的论著还很少,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军民关系思想、党员教育思想等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在批判单纯军

事观点的基础上,指明了党领导下新型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以往所有军队的本质不同。

第一,通过宣传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了让人民群众明了红军革命的意图,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批评了当时一些地方存在的取消主义倾向,不愿发动群众,错失了许多斗争机会。他认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③。红军中大部分人还受旧思想和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存在着军阀残余的流寇思想,更不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宗旨和目的是为了人民。毛泽东认为把带有原始游民思想的队伍打造成新型军队,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思想教育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明白红军打仗是为了谁,通过宣传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大力支持,这样红军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

在总结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毛泽东确立了红军宣传工作的内容、技术和方法。如何宣传群众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认真总结了二十条宣传内容和宣传技术方面存在的缺点,着重指出忽略鼓动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宣传、不重视对青年的宣传、宣传缺乏时间性和地方性等问题,直接影响到群众对红军的认识和理解,长远就会产生红军后继力量不足的重大问题。宣传队伍不健全、理论水平低、宣传内容陈旧且语言不能深入人心、宣传经费不足、群众大会开得少等问题也直接影响宣传效果。针对二十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二十条纠正办法,集中起来就是明确宣传目的、找准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适当方法、区分不同的宣传对象、不断创新宣传方法。不仅要注意不同阶级或不同群体的宣传对象,还要注意群众情绪。毛泽东指出:“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①在宣传技术方面,毛泽东提出采取壁报、画报、化妆宣传等形式提升宣传效果。这些宣传内容和宣传技术原则对当前党的宣传工作仍然具有指导价值。

第二,通过有效的宣传来组织群众,进而武装群众,形成军民联合的革命力量。古代的军事家都懂得“兵无民不坚,民无兵不固”的道理。但是,历史上很少有军队能和老百姓团结在一起形成革命合力。一方面,旧军队官兵打仗的目的是升官发财,不可能与老百姓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另一方面,农民缺乏组织观念,更没有纪律意识,很难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当工农革命军进入罗霄山脉需要直接与农民接触时,就必须解决军队与百姓的关系问题。如果毛泽东缺乏远大志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就不可能把地方武装改造成革命军队,而很可能会与袁文才、王佐合作,占山为王。但是,毛泽东立志解放穷苦大众的坚定信念和目标决定了他必定不会偏安于井冈山一隅,而是为人民进行革命,建立一支与以往旧军队完全不同的新型军队,通过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和为人民群众争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只有这样革命才有可能成功。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②通过宣传红军革命的目的、意义等,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认识红军、理解红军,让广大百姓明白自己以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和红军一道为自身利益和权利抗争的斗志。红军每解放一村一县,都及时开展土地革命,让祖祖辈辈为地主做工的贫苦农民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深切感受到红军在为他

们谋利益,就向红军送粮食、送子参加革命部队,与国民党依靠“抓壮丁”扩大军队形成鲜明对比。红军的力量不断壮大,在革命中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敌人。

宣传工作做好了才能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消灭敌人,建立工农兵政权,实现穷人当家,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古田会议决议》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专门论述“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明确了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分工和职责。在“红军与群众的关系”中,提出了“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③。组织和武装群众不是停留在宣传上,而是进一步明确了如何组织和武装群众,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

四 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融合力量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决议》正是毛泽东对1927年8月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正如陈丕显在纪念古田会议召开60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是毛主席对工农红军从1927年8月南昌起义创始到1929年1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党与错误思想斗争的经验总结,“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包括朱德、陈毅等同志,共同坚持马列主义,克服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产物,是他们运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成果”^④。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确立了党的军队的性质和宗旨,采取了正确的军民关系策略和方法,才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能够立足并不断发展壮大。

毛泽东把初建的工农革命军缔造成前所未有的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新型人民军队。1930年1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④陈丕显:《发扬古田会议精神 把我党我军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1期。

月下旬,毛泽东在东韶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利用军阀混战之机,部署红军行动,要求进一步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会后,毛泽东与朱德指挥红四军各纵队攻打乐安、宁都等地。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直接指导“宁都县委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解决宁都土地改革问题”^①。打了胜仗后首要的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给贫苦农民分地,让百姓实实在在尝到红军带来的好处。1930年3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练,“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大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②。毛泽东不仅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建军原则指导红四军为人民群众解决困难,而且还不断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军队建设的措施和策略。1930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在寻乌马蹄冈召开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③。红军之所以能够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打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不能不承认苏区人民群众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直到1931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才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路线是正确的,特别肯定了军队群众工作的路线和方法^④。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要关心群众生活,强调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和全力支持,军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38年

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文中还专门谈及军民关系。他说“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⑥。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东北、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大部建立了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联合成为重要的抗日力量。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也真正打成了人民战争,自愿参加和支援解放军的老百姓不计其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建立了真正的鱼水关系。军民齐心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纪元。1949年5月1日,柳亚子先生问来访的毛泽东,共产党要胜利了,但是,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说“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⑦。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⑧初建时的工农革命军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直至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是人民利益的守护神,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妨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事件面前,解放军仍然是冲在前面的。

结语

毛泽东的军民关系思想在新时代仍然有指导作用。他提出的宣传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找准宣传工作的方法、注意宣传对象、探索宣传技术的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30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思想,对加强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仍然具有借鉴价值。新时代党中央确立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对毛泽东军民关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2014年10月,古田会议召开八十五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议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

工作,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新时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具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义务,这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Mao Zedong's Thought on Military-Civil Relation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arty's Military Building and Its Value

WANG Li & WU Qi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troops to turn to Jinggang Mountains, Mao Zedong touched on how to sol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he proposed “three major disciplines and six points of attention”, which became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buil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and won the ful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of the people in the base area. Mao Zedong guided the army to help establish peasant armed forces and the regime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carry out the land revolution, and make farmers realize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s army is the embodiment of poor workers and peasants, vowing to fight for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new military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to promote the masses, organize the masses, arm the masses, and fight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army fough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selflessly supported the people's army. The people's army established a flesh-bl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playing a huge rol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three major disciplines, six points of attention”; Resolution of Gutian Congress; people's interests

(责任校对 唐尧)